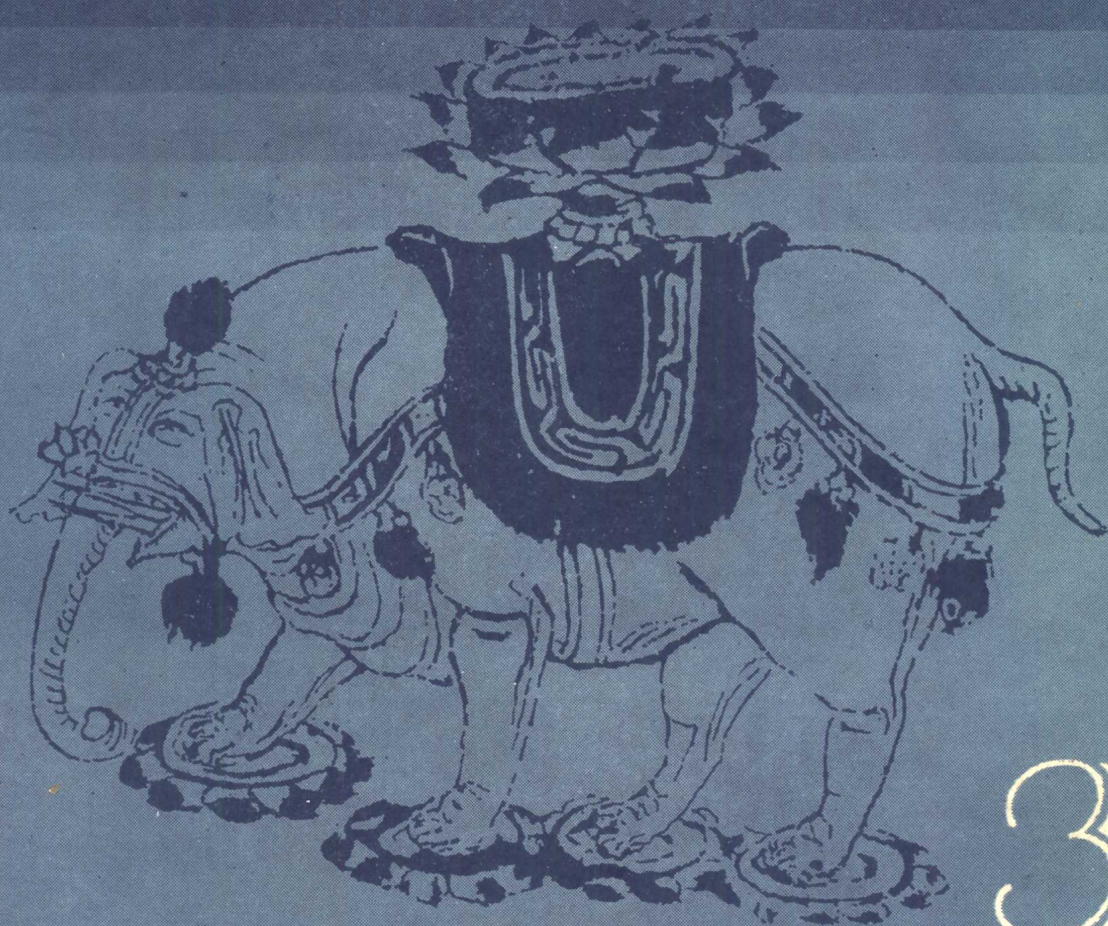


中亚学刊

ZHONGYA XUEKAN



3

中華書局

中亚学刊

第 三 辑

中 国 中 亚 文 化 研 究 协 会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室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编委和本期编辑

(按姓氏笔划为序)

编委:	余太山	陈高华	谢方	
本期编辑:	王 诤	宋 岷	宋晓梅	余太山
	陈高华	吴 焯	吴玉贵	康右铭
	谢 方	谢孝苹		

中 亚 学 刊

第 三 辑

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 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室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1/16·18 $\frac{3}{4}$ 印张·352千字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册 定价:8.85元

ISBN 7-101-00419-9/K·29

中 亚 学 刊

第 三 辑

目 录

公元前七至二世纪的中国新疆地区	马 雍 王炳华(1)
大夏和大月氏综考	余太山(17)
小月氏考	荣新江(47)
新发现的几件佉卢文书考释	林梅村(63)
《水经注》中的扞泥城和伊循城	章 巽(71)
库木土拉石窟壁画的风格演变与古代龟兹的历史兴衰	吴 焯(77)
关于敦煌藏文写本《吐谷浑(阿柴)纪年》残卷的研究	周伟洲 杨 铭(95)
公元八世纪初年的粟特——若干穆格山文书的研究	马小鹤(109)
北宋与西北各族的马贸易	汤开建(139)
《福乐智慧》与波斯文学	王家瑛(165)
元初的元-伊联盟与中亚交通——兼考马可·波罗	
抵忽炭三地之年限	任荣康(184)
刘郁《西使记》不明地理考	张广达 王小甫(199)
陈诚及其《西域行程记》与《西域番国志》研究	王继光(214)
亚洲腹地的斗争——试论清朝政府对蒙古的宗教政策	康右铭(242)
《米诺哈志》的作者及其波斯文动词分类原则初探	刘迎胜(258)
评罕伯莉校勘本《完者都史》	皮路斯(284)
编后记	(291)

JOURNAL OF CENTRAL ASIAN STUDIES Volume III

Content

Xin Jiang Area of China from 7th to 2nd Century B.C.	Ma Yong & Wang Binghua (1)
A Study on Da-xia and Da Yue-shi	Yu Taishan (17)
Problems about Xiao Rou-Zhi	Rong Xinjiang (47)
Several New Kharoṣṭī Documents Discovered	
Recently, translation and notes	Lin Meicun (63)
The Yu Ni and Yi Dun Towns of Shui Jing Zhu	Zhang Xun (71)
The Changing Stile of the Frescoes in Qum Tura	
Grottoes and the History of Acient Kucha	Wu Zhuo (77)
A Study on the Tibetan Fragment A zha (Tu Yu Hun)	
Annals of Dun Huang	Zhou Weizhou & Yang Ming (95)
Sogd in the Early 8th Century, a study of	
several fragments of Kūh-i Mugh	Ma Xiaohe (109)
Horse Trade between the North Song and	
the North-Western Nationalities	Tang Kaijian (139)
Kutadgu Bilig and the Persian Literature	Wang Jiaying (165)
The Yuan-Ilkhanate Alliance and the East-West	
Communication through Central Asia, also a study	
on the time of Marco Polo's arriving in Khotan	
and the other two places	Ren Rongkang (184)
Locations of Some Places in Liu Yu's	
Xi Shi Ji	Zhang Guangda & Wang Xiaopu (199)
Chen Cheng and his Xi Yu Xing Cheng Ji	

and Xi Yu Fan Guo Zhi	Wang Jiguang (214)
Struggles in Inner Asia, the religion policy of the Ching government to the Mongolian people	Kang Youming (242)
The Author of Minhāj al-Ṭalab and a Preliminary Study of its Verb Classification	Liu Yingsheng (258)
Commentary on Mahīn Hamblī's Collation and Proofreading of Tārīkh-i Ūljāitū	Pi Lusi (284)
Postscript	(291)

公元前七至二世纪的中国新疆地区

马 雍

王炳华

中国的新疆地区位于中央亚细亚的东部,它被天山山脉分隔成南北两个自然条件不同的区域。天山以南为塔里木盆地。以北为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的西面是号称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南面是昆仑山脉和阿尔金山脉,北面是天山山脉,这三面都被连绵不断、冰雪长封的高峰所包围,其间只有少数峡谷和山口可以穿越。它的东面却比较低敞,与河西走廊相接。这个盆地略似一个倒置的梯形,中央为一片面积辽阔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所占有。昆仑山脉、帕米尔高原和天山山脉的雪水从不同的方向流向沙漠,形成许多短小的内陆河。在这些内陆河的中下游出现若干绿洲。每一个绿洲面积都不大,彼此保持一定的距离,中间隔以沙漠,交通不便。从远古以来,人们就只可能在这片大沙漠边缘的绿洲中生活。

准噶尔盆地则有似于一个等腰三角形,它的南面是天山,东北面是阿尔泰山,西北面只有高度不大的一些小山脉,东西两边都没有形成封闭式的屏障。这个盆地南面的天山山脉有许多水草丰茂的峡谷,北部的乌伦古河、额尔齐斯河、西南的伊犁河上游都是宜于游牧的场所。

新疆地区从遥远的旧石器时代起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到公元前五世纪时,中国的文献中开始对这里的情况有所报道。但在公元前二世纪以前,有关这个地区的记载仍很简略,资料贫乏而分散,大多得自传闻,准确性不足。至于西方文献,则在公元前对此地更少涉及。某些学者认为希罗多德根据阿利斯铁阿斯(Arestas)的报导所叙述的最遥远的东方部落就是阿尔泰山地区的古代居民,这只是一种推测。⁽¹⁾我们对这一地区在公元前七至二世纪期间的历史状况,主要只有从考古资料来了解其面貌;其次,据中国和西方古代文献中的零星报道,也有助于对这些资料进行一定程度的分析。

现就近年来考古发掘的收获,对新疆地区这一时期的几处文化遗址略作介绍如下:

(一)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香葆葆古墓葬遗址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隅,地处帕米尔高原的东部。周围地势平均高达海拔 4000—5000 米。塔什库尔干河发源于喀喇昆仑山北端,向北流至海拔

七千多米的慕士塔格山南麓,折而向东,注入叶尔羌河。这里山谷纵横,气候高寒。河谷地带相对高度较低,气温稍高,受雪水滋润的草场宜于放牧,为现代居民分布之地。县城位于塔什库尔干河流向东处,由此溯河而上,然后转向西南,有通往阿富汗瓦罕地区和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地区的山道,这就是古代著名的丝绸之路南道的咽喉之一。

在河谷地带的草滩上发现大量的古代墓葬,外形隆起,呈圆形或方形,上面封以石块;封石下的墓穴多作园形或椭圆形。考古工作者在县城附近的香葆葆发掘了四十座这种类型的古墓,对墓中出土物进行C14测定,表明这些墓葬应属公元前七至四世纪的文化遗存。⁽²⁾

这四十座古墓地点集中,数量并不多,随葬品大体相同,应属同一文化类型。但在葬式上却呈现多种多样的复杂现象。主要的差别在土葬与火葬两种不同的习俗。凡火葬的墓穴口不加盖木,而土葬的墓穴口均有盖木。在土葬墓中,又有直肢葬、屈肢葬、仰身葬、俯身葬等不同型式;同时还有个体葬与合葬之别。其中四座墓有殉人迹象。墓中尸骨大多腐坏,只有一件头骨保存较好,经人种学测量分析,认为具有印欧人种特征。⁽³⁾

大多数墓中随葬品均较贫乏,只有少数墓出土物较丰富,说明当时居民物质生活相当贫困。出土物以生活用具和各种装饰品为主。陶器均出自手制,无一轮制者。陶土中掺杂粗砂粒或云母片,火候不高。绝大多数系素陶,表面呈红褐色或灰褐色,色泽不匀;个别陶器上附饰凸起的弦纹和指甲纹。凡此均表明当时制陶技术水平不高。器物以炊具及日用盛器为多,如釜、罐、碗、钵、杯等,大都圜足。随葬陶器具有明显的使用痕迹,甚至残破后经过补绽。除陶器外,也发现一些金属用具,如铁刀和铜镞等。

装饰品种类繁多,有金牌、铜或铁制的指环、耳环、扣饰以及陶、石、骨或玛瑙制的串珠等。其中一件羊头形图案的铜饰片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

此外在墓中发现一些用羊毛纺织的平纹毛布和羊皮裘;还有相当多的兽骨和鸟骨,尤以羊骨为多。

在出土物中有一件钻木取火器,木片略呈长条形,中间厚,边缘薄,侧旁凿槽,与烧灼成焦黑色的钻窝相通。这种钻火器在塔里木盆地周围绿洲的古代遗址中多见。

根据以上的资料判断,可以看出在这个地区,曾有过长达数百年的居民点。其居民营定居生活,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尤以养羊为大宗;射猎仍为重要的副业。羊是人们生活的主要资源。手工业水平较低,但已学会使用金属。社会组织中已出现显著的贫富差别,且有杀殉现象。人们对服饰颇为重视,并具有一定的审美观。人死后用生前生活用品随葬。至于埋葬型式的多种多样,不知是由于居民种族成分的复杂,还是由于时代先后不同所呈现的现象。至少,就土葬和火葬两种习俗共存的情况来看,似有可能表明这里有着不同民族文化的混合。根据地理位置分析,这里西与塞种分布地区相邻,南与羌族分布地区相邻。上文所述

土墓葬所出印欧人种头骨可能属塞种。而羌族之盛行火葬,见于先秦文献记载。⁽⁴⁾因此,我们推测塔什库尔干地区这类古墓葬可能代表一种塞种与羌族混合型的文化。

(二) 若羌县罗布泊西北岸古墓葬遗址

罗布泊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东南端,正当河西走廊通塔里木盆地的要冲。今天的罗布泊已完全干涸,成为低洼的盐碱地;而在古代,这却是一个面积很大的咸水湖。塔里木河从西北来,注入它的西北角;车尔臣河从西南来,注入它的西南角。河口三角洲水草丰盛,宜于放牧。湖中的水生植物、鱼类和禽鸟可以为人类提供充足的生活资料。近代以来,上述两条河流水量大减,并已改道,不再注入罗布泊;但仍有塔里木河的一条支流孔雀河从故道流向这片洼地。罗布泊西北岸孔雀河入口之处就是著名的楼兰遗址。公元前一世纪时的楼兰国都城即在此地。

在楼兰遗址附近,早就发现过一些古代墓葬遗址,过去,人们一直把这些墓葬归属于西汉时代的楼兰人。但是,近年来中国考古工作者对此地重新进行了发掘,根据新的资料鉴定,这种墓葬的延续年代很长,上限可以上溯至公元前七世纪,下限到公元前一世纪。⁽⁵⁾

这种墓葬的特色是在浅浅的沙窝内,用几块木板简单地拼成棺室,死者直身卧于棺内。尸体包裹毛布,头戴棕褐色尖顶毡帽,足穿皮靴,帽上斜插几枝鸟翎;女性帽缘上往往绣几道平行彩线。包裹尸体的毛布在颈下胸前处结成一个小囊,内盛碎麻黄枝。这一点毫无例外,显然是当地居民一种固定的风俗,其意义尚不明了。在死者胸侧,大多有一个用麻或草料编织的小篓,中盛麦粒,数量可以多至150余粒,有普通小麦和圆锥小麦两种。这似乎也是当时流行的葬俗。

由于当地气候极度干燥,不少尸体都成为干尸,保存良好,有利于人种鉴定。这些居民的形象特征很鲜明,黄发微卷,高鼻深目,睫毛较长,双颊不宽。据人种学测量数据表明他们具有阿尔卑斯人种特征,与帕米尔、兴都库什地区古代居民相似。在这些墓中,还见到一些木制或石制的女俑,具有长圆脸型,头戴尖帽,长发梳辮,垂于颈后,拖至肩部。上身着毛线编织的衣服。乳部丰满,臀部肥硕。这种形象与墓中女性死者基本相同,可以作为对这些居民的体态和服饰的写照。

出土随葬品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品和装饰品。在早期的墓中未见陶器,用具多系草编、木制或骨、角制成。居民们利用当地盛产的野麻、芨芨草、柽柳枝等编制成杯、罐、篓等大小盛器,并借原料光洁程度不同而组织成花纹。个别草篓外部涂上红色。木盆、木杯、木杓、角杯均较多见。居民的衣着材料主要为毡制品、毛织物和皮革制品。毡制品普遍使用,毡帽人各一顶。毛织物几乎全系平纹,一般粗糙,少数较平整细密。皮革未经鞣制,使用生皮,但制作工艺水平不低,如皮靴式样多种,颇为美观。

装饰品中常见者为骨珠,用鸟类长骨切断,磨成小珠。把许多骨珠串起来挂在腕部和颈部。也有少数串珠是用玛瑙、琥珀或玉制作的。此外,还用小动物的骨骼制成十公分左右的骨管,将数十支这样的骨管串起来系在腰际,作为一种装饰。

随葬品中还有大量的羊、牛角。

不难看出,这些墓葬的主人是以畜牧和渔猎为主要经济活动的,他们的生活资料绝大部分来自动物,其次依靠当地的一些野生植物。虽然在他们的随葬品中发现少量麦粒,但在这片遗址中却未发现任何农业生产工具,附近也未发现属于这段时期的农田或灌溉工程的遗迹,似乎表明这些居民并不从事农业经济。至于那些麦粒,可能是从邻近从事农业的部落交换来的。按《汉书·西域传》云:鄯善国“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楼兰遗址属于鄯善国境,这里的确是多沙卤之地。可能其居民早在汉代以前即如《汉书》所说的那样从“旁国”获取谷类粮食资料。他们之所以把麦粒贮在胸旁篓中,或许正是象征这种谷物来之不易,作为珍贵物资的意思。从物质条件来看,这些居民的生活水平很低;但从服饰来看,他们却具有较高的审美观。

如果说,这些墓葬的主人确系西汉时代的楼兰人,那就表明他们定居在这里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这种文化在公元前一世纪以后不再出现,是否由于此地的楼兰人在公元前77年迁都于罗布泊西南的鄯善以后就离开了这里,这一点尚难断言。在这种墓葬文化遗存中占突出地位的尖形毡帽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尖帽塞卡人,但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还不足以使人对此作出任何结论。

(三) 吐鲁番县阿拉沟卵石墓葬遗址

阿拉沟是一条山溪,发源于焉耆北面的天山南麓,在狭窄的山谷中向东流去,出谷口,至吐鲁番县南注入艾丁湖。这条山沟是沟通吐鲁番盆地和尤勒都斯草原的天然孔道。在山沟东段的谷口处发现大量古代墓葬遗址。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可以明显地看出它们分属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其中之一就是以卵石墓室为特征的遗址。⁽⁶⁾

这一类型的墓葬多选择河谷较平缓的台地或山梁,挖成一个圆形或椭圆形的坑穴,用河谷中的卵石依坑穴周壁砌成墓室。墓室一般深二米左右,直径约二至三米,朝东面留一个小缺口,象征墓道。上口与地表大致相平,口上复盖一、二层圆木,圆木上再堆叠石块,形成隆起于地面的封石堆。像这样的封石堆在该地分布甚密,极为显目。此外,在艾丁湖和鄯善县的苏巴什等处也发现与此形式和内涵相同的墓葬,据此可以大致看出这些墓葬主人居住地点分布在吐鲁番盆地各处。⁽⁷⁾

对墓中出土木材进行多次C14测定,表明这些墓葬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二世纪之间,可见这种文化的延续时间颇长。根据葬式及随葬品可以区别之为前、后两

期。

前期盛行丛葬制度,每一墓室中所葬尸体,少则十多具,多至二十多具。男女老幼同葬一室,层层叠压,一律平列仰卧,头朝西面。随葬品置于死者头侧和腰际,脚下放置相当数量的羊头、马头或牛、马的下肢骨以及羊角、骆驼骨等,似用以表示死者生前的财富。

有一些死者的头发未朽坏,可以看出他们的发式。他们都留着长发,中分为两半,每一半梳成三至五根小辫子,再合股编成左右两根大辫子,将这两根大辫子交结在脑后,插上骨簪或木簪使之固定,然后罩上一个编结精巧的丝质发套。在墓中还见到大量短木梳,约十余根梳齿,即为梳辫之物。

随葬品突出地反映了畜牧业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占主要地位。大量殉葬的羊、马、骆驼的骨殖,以及许多从事畜牧的用具,如腿绊、鼻栓之类,都说明了这一点。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的毛织物和毛毡。原料多为羊、驼、牛毛。毛线搓捻细匀。纺织物品种很多,既有大量比较粗糙稀疏的织物,也有不少厚实细密的毛布和线毯。有平纹、斜纹两种。颜色基本为黑褐色,少量染成淡蓝、浅红、深黑等色,并织成条纹、格纹、三角纹等图案。凡此均足以显示他们的毛织业有相当高的水平。墓中也见到许多木制或陶制的纺轮,那就是他们捻毛线的工具。

除了畜牧业以外,他们也从事一些农业活动,墓中出土的陶罐中见到若干农作物的种籽,其中还包括胡麻。狩猎仍不失为一种重要的补助手段,墓中可以见到不少木箭杆和用硬木削成的三棱箭镞。

日常生活用具中以陶器和木器为主,也有铜器。陶器中彩陶所占比例较大。陶质颇粗,夹砂,火候不高。器物有罐、盆、钵、壶、杯等,均系手制。一般陶器都在灰红色陶衣上施以淡黑色纹彩,多作三角形纹、网纹、涡纹、松针纹等图案,色泽不鲜明。木器则有盘、盆、杓、杯等,制作颇精,有些木盘底座安上四条小腿。铜器数量不少,主要为圆形铜片和小铜刀。小铜刀与砺石一同放在男性腰际,似是他们生前日常佩用之物。

几乎每一座墓中都发现相当多的钻木取火器。木片扁平,长约20厘米,宽仅2—3厘米,形制与前文所述塔什库尔干所见者相似。钻孔均曾烧灼过,呈焦黑色。可能他们在生活中常用此法取火。

他们的装饰品在工艺上富有特色。出土物中有大量的骨制串珠、玛瑙珠、翡翠珠、铜或金制耳环,有的耳环上附着骨珠。此外还有用海贝制的装饰品,原料有货贝(Monetaria Moneta)和环纹货贝(Monetaria Annulus)等。一些骨雕以野猪、熊等兽头为题材,形象甚为生动。

后期在葬式方面与前期有所不同,这时出现了一种棚架式葬具,即在圆形卵石竖穴内立四根柱脚,其上铺设木棚,尸体置于棚上。同时,丛葬制也转变为单人或双人葬,表明社会组

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后期在随葬品方面有下列一些显著的变化。第一、开始出现铁器,包括铁制的工具和兵器。第二、出现了丝绢、凤纹刺绣、漆耳杯等显然从中国内地传来的工业品。第三、彩陶数量减少,素陶(主要为红褐色,次为灰褐色)大量增加。第四、出现一些前期未见的器形,突出的有陶豆和类似豆形的木制高足盘。所有这些变化都表明当地居民在这个时期开始受到中国内地文化和经济的影响。大家知道,中国内地的著名特产丝绸从公元前六、五世纪左右开始向中亚、西亚传播,并远达欧洲各地。吐鲁番盆地正处于这条丝绸之路东端的要道上,阿拉沟这些卵石墓葬文化的主人之开始接受中原地区影响看来不应晚于公元前六世纪。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吐鲁番县西雅尔湖沟北地区曾发现一批古墓,其随葬品位置、内容和陶器特征均与阿拉沟卵石墓葬文化基本类似。⁽⁸⁾前者显然是属于车师人的早期墓葬,因此,我们推测阿拉沟以及艾丁湖、苏巴什等处这一类墓葬均属车师文化。如果这一假说能够成立,即可认为车师人至晚自公元前八世纪以来已定居在吐鲁番盆地。

(四) 吐鲁番阿拉沟竖穴木椁墓葬遗址

在同一阿拉沟东口,与上述卵石墓葬遗址相距不远处,又发现属于另一种文化类型的古墓葬遗址。⁽⁹⁾

这种古墓在地面上有堆石为标志,外有方形围墙;按南北方向以次排列,有如链条。石堆下为一规模颇大的竖穴。以一个竖穴为例:长6.56米,宽4.22米,深7.1米,空间体积约200立方米。穴中填沙积石,石块大者可达1立方米,系从附近河滩移来。穴中央为一木椁室,用附近天山中盛产的松木砌成——将木材砍削整齐,贴近墓室四壁左右纵横交错排列,顶部亦用木材覆盖,构成椁室。椁室内还有葬具,但葬具均已朽坏,仅余灰烬,难以恢复其原状。

死者或系单人葬,或男女合葬。尸体均仰身平卧。入葬前似曾用一种红色物质对尸体进行过处理,当肌肉腐烂后,这种物质渗透到骨架上,现仍可在残余的骨殖上见到这种朱红色的痕迹。在一件女性头骨上,见过一个直径约5毫米的钻孔。大多数墓由于木椁顶朽坏后堆石下坍以致墓室内被砸乱,还有些墓曾遭到早期盗掘,因此,死者骨架大都保存不好;但根据残余骨骼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些死者的体格是十分健壮的。

这批墓葬的年代,经C14测定,约相当于公元前四至公元前二世纪。可见这一文化在此延续的时间并不长,而与上述卵石墓葬文化的后期曾同时存在于同一地区之内。但这两种文化彼此的影响却不显著。

这批木椁墓的随葬品都相当丰富,且较为精美。奢侈品和金属器物占有很大的比例。其中金器很有特色,有金牌、金箔饰片、金串珠等物。金牌呈圆形,质地较厚重,在硬质模具

上捶压成虎形图案。虎头微昂,前腿举至颌下,躯体蜷曲成半圆弧,后腿翘起,方向或左或右,全身处于激烈运动姿态下,非常生动。这种金牌原来嵌附在皮制物上,可能用作带饰。金箔饰片质地较轻,厚度与一张厚纸相近;数以百计,形制不一,或作兽形,或作柳叶形、菱形、圆形等。兽形金箔片多作跳跃奔腾的狮子或一对相向踞伏的老虎。这些金箔饰片的边缘和两端均有穿孔,显然是缝缀在衣服上的装饰品。墓中出土一批银牌,也压制出各种兽纹图案,当与金牌用途相同。还有一件特别值得注意的铜盘。这件铜盘通高32厘米,分为三个部件:器座、盘身和盘中所承的兽形。器座正方,呈喇叭口状。盘身亦作方形,周边伫立一圈走兽。盘中央伫立两个似狮形的小兽。三个部件分别铸成后再焊接在一起;其焊接的方法是在接合部位倾注铜液,或附贴一薄铜片而后注以铜液,看似粗糙,实很坚牢。这种特殊形制的承兽铜盘在伊犁河谷新源县境内的古墓葬中也曾发现过。除了上述金、银、铜器以外,还有不少铁器,如小刀、箭簇之类,多系生活用具或随身武器。所有的金器、铜器和铁器冶炼技术水平都比较高,提纯度较大。只有银器提炼不纯,上述出土银牌经光谱分析,含银量仅超过10%,其他成分包括金(Au)、铜(Cu)、铅(Pb)、铋(Bi)、钠(Na)、锶(Sr)、钙(Ca)、铝(Al)、硅(Si)、镁(Mg)等杂质。

其他奢侈品则有玛瑙珠、珍珠、丝织品(如菱纹罗等)、漆器(如漆盘、漆杯等),后两种高级消费品毫无疑问来自黄河流域地区,说明这一文化的主人与内地之间已经存在密切的物资交流关系。

出土物中的日常生活用具以陶器和木制器皿为主。陶质细腻,不夹砂;陶胎经过压磨,表面光泽,并加涂酱红色陶衣。陶器虽多出自手制,但造型规整,技巧很好;火候也较高。器物类型有带流筒形杯、碗、盆、盘、小杯等;有的盘底附三平足,颇具特色。这些陶器与上述邻近地区卵石墓所出陶器有显著的区别。木器以木盘为多,盘中放置羊骨和小铁刀,可以证明是食具。

墓中所出兽骨以羊、马骨为最多。

我们所发现的这批木椁墓,随葬物中很少见到生产工具,绝大部分是生活用品和高级奢侈品。看来这些墓的主人不会是一般的游牧民而应当是游牧部落中的酋长贵族及其家属。

从这些墓葬南北排列、木椁结构、出土器物的内容和特色来推测,似与乌孙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上述种种特征在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墓葬中也能见到。⁽¹⁰⁾我们在河西走廊张掖到敦煌之间还发现不少外形与此相同的墓葬,亦按南北方向排列成行。根据《汉书》所载张骞从匈奴中了解到的乌孙历史得知,乌孙部落原来与月支人同住在河西走廊的西部,后月支人攻杀乌孙的酋长难兜靡,夺取其居地,乌孙部众逃奔匈奴。当时难兜靡的儿子昆莫还是一个新生出的婴儿,等到他长大成人后,匈奴单于将乌孙部众还给昆莫统领。昆莫在匈奴中担任将

领,参加过若干次战役。就在这段期间,月支人已被匈奴击败,西迁到伊犁河流域。其后,昆莫为了复仇,又率领乌孙部落脱离匈奴,向西进攻月支,从伊犁河流域将月支人赶走而占有其地。这些事件都发生在公元前二世纪上半期。⁽¹¹⁾由此可见,乌孙部落从原来居住的河西走廊西部被月支人赶走以后曾投靠匈奴约数十年之久,这时候匈奴势力已相当强大,完全可能向西越过阿尔泰山而到达博格达山南北麓;换言之,当时吐鲁番盆地阿拉沟一带可能已处于匈奴控制之下。因此,我们推测乌孙部落投靠匈奴时或即在此处居住过,在这里发现的木椁墓葬就是他们留下的文化遗迹。无论从C14所测定的绝对年代来看,从文化内涵的对比研究来看,或从地理位置来看,这一推测都是能与历史背景相符合的。特别是,这种墓葬文化在该地延续时间不长,对邻近的不同文化并未产生过影响;而乌孙部落投靠匈奴的时间最多不过二、三十年,正好说明了这一点。乌孙本是与月支人有着密切关系的部落。月支人早就与黄河流域有着历史悠久的经济联系,因此,在乌孙贵族的墓葬中出现许多丝织品和漆器也就是很自然的现象了。

(五) 天山东端北麓的定居文化

天山山脉的东端横亘于新疆东北部,与从西北向东南斜伸的阿尔泰山脉的南端形成一个喇叭形的地带。由于阿尔泰山南端的坡度不大,使得这个地带成为东面的蒙古高原与西面的准噶尔盆地之间的天然通道。古代许多游牧民族经常穿过这条通道东西迁徙往来。这个喇叭形地带的北半部是一片荒瘠的戈壁,既不便交通,更难以居住。它的南半部则是天山北麓的山前地带,水草丰茂,不仅是良好的牧场,亦宜于农作。我们就在这一线地带发现不少古代定居文化遗址。

这些遗址可以分为东、西两个地区。东区的遗址散布在今伊吾县的吐尔干和巴里坤县的松树塘、冉家渠、奎苏、石人子等处。遗址的外貌为隆起于草原上的小丘,高出地面约数十厘米至一米多不等;面积一般为1,000—2,000平方米,最大的一处达7,000平方米。遗址均遭到不同程度的后期破坏。⁽¹²⁾

遗址内仍可见到残存的房址,墙垣是用土坯和石块砌成的,最厚处达60厘米,屋墙砌得这么厚是为了防御当地冬季的严寒。出土器物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大量巨型石磨盘,一般长约80厘米、宽约50厘米;最大的一件长达114厘米,宽50厘米,厚20—30厘米。在奎苏遗址,一处即发现这种石磨盘三、四十付,其中段凹陷较深,显系长期使用所致。不少遗址内出土彩陶器,器形以罐为主。这种陶罐小口、鼓腹、小平底,腹部有双耳。此外也有单耳杯。大多为红衣黑彩,花纹有倒三角形(或在其中再填以网纹)、波状纹组成的宽条带等。与陶器同出的有磨制石斧、石镞等,也见到厚重的铜斧和小铜刀。

这些遗址分布在北山和天山之间的草原地带,东有吐尔库里湖,西有巴里坤湖。巴里坤

湖即古代著名的蒲类海。据《后汉书·西域传》，蒲类国本来是一个半游牧半从事农业的较大的部落，当匈奴控制西域时，蒲类王得罪匈奴单于，单于将该国六千多口迁往远处，余下的少数居民逃亡到山谷间；而后来蒲类之地被完全从事游牧、不知农作的移支国所占有。蒲类国的原居地应与蒲类海有关，因此，我们推测上述巴里坤湖以东的古代定居文化遗址很有可能是属于早期蒲类部落的。

至于西区的定居文化遗址可以举木垒县西十公里左右的四道沟遗址为代表。⁽¹³⁾这一遗址是一个古代的村落，面积达10,000平方米。通过发掘证明，这里曾经两度成为居民点，文化层可分为早、晚两期。据C14测定，早期约相当于公元前1,000年前后，晚期约相当于公元前四世纪前后。从各方面看，早、晚期的文化虽有时代上的差异，但有着更显著的共同性，似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

遗址包括居住遗址和墓葬遗址。居住遗址有柱洞、灶址和灰坑。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尚难恢复其原来的房屋建筑结构；仅就早期柱洞和灶址的分布状况观察，其房屋似作圆形。早期个别柱洞底部填有数块小卵石；晚期几乎所有柱洞底部都填入小卵石，有的柱洞底在卵石上再置一块石片作为柱础，表明建筑技术有所进步。早、晚期的灶坑都用片状卵石砌底和采用石壁式灶。灰坑在房屋周围，出土物有陶片、羊骨和木炭渣等。

墓葬遗址距居住遗址不远。他们实行土葬，有封土，封土上加压卵石。墓室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或在长圆形竖井墓道底部侧面再挖一圆角长方形墓室。大多采取单人葬，仰身直肢。随葬品稀少。

文化遗物多出自居住遗址，包括陶器、石器、骨器和铜器等。陶器的陶质多为夹砂粗陶，陶色为褐色或褐红色。均系手制，多圜底器。器物有罐、盆、钵、刀范、纺轮等；晚期增加杯、釜、弹丸等新器物，容器上并出现半月形把手。早期彩陶均为黑彩，纹饰以网纹、菱形纹、弧线回纹为主。有的内外施彩，内彩绘于器口，器口戳孔。晚期彩陶比例增多，还出现朱彩。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百分之八十左右为磨制，制作技术较高。器物有磨盘、杵臼、纺轮、锄、铤、球等。骨器则有纺轮、针、梳和箭镞等。铜器有刀、筭、环和饰件等。此外还出土大量的马、牛、羊、狗等动物骨骼。

上述文化可以看出遗址的主人过着长期定居的生活，经营农业和家庭牧业，并以狩猎为副业。陶刀范的出现说明他们自己已掌握铸造铜器的技术。他们的彩陶与甘肃西部的沙井文化遗物相似。

(六) 阿尔泰山西麓几种不同类型的古墓葬遗址

阿尔泰山绵亘于新疆的东北边境上，在这条山脉与准噶尔盆地之间贯流着乌伦古河和额尔齐斯河。这个地带是一个理想的游牧场所。高山地区宜于夏季牧放，河谷平原宜于冬

季牧放,而山前丘陵则宜于春、秋两季牧放。历史上不同时期内都有游牧民族在这里活动,并留下了他们的遗迹。在山上到处都能见到大片的岩刻画,内容主要是大角羊、马、鹿及弯弓射箭和舞蹈等形象。这种岩画在新疆各地和苏联境内都有大量发现,但其年代不一,差距很大。我们在昭苏的清代乾隆年间石碑上见到过这种刻画,内容形式完全相同,那显然是十八世纪以后当地牧民在碑上刻划的。因此很难对这种岩画作者的时代和族属作出判断。

考古工作者在这个地带还发现了各种类型的古代墓葬,属于本章所讨论的时代范围内者大致有三种类型。

第一为大型石冢。这种石冢主要分布在青河县花海子海拔3,500米的高山上。其中最大一座石冢高达10—15米,周长230多米。周围环绕一圈石块,圈围宽5米,直径达210多米;以石冢为中心,与四方有石径连通,构成一“⊕”形。其建造规模十分宏伟。在这座大墓之北约300米处竖立一高达2.2米的方形花岗石柱,每边均为25厘米,表面磨平。石柱南、北两面都刻着奔鹿,南面七头,北面五头。鹿头上为多枝角,屈足,形象生动。大墓东面10米左右又立着另一石碑,高1.75米,碑上部刻画一圆形和一菱形图案,下部刻一短剑和一只小羊的图形。这种石碑在富蕴县境内也发现过。

这批古墓未经发掘,对其文化内涵尚不清楚。据苏联境内图瓦共和国、米努辛斯克盆地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希额依德尔苏木等地所发现的与此有共同特征的文化判断,这些墓葬可能属公元前7—5世纪时代游牧民族的遗址。⁽¹⁴⁾

第二种为一种石人一石棺墓。这里所指的是与通常认为属于公元后突厥时代的石人墓有明显区别的另一种墓葬。这种墓葬遗址在阿尔泰地区分布较为普遍。所谓突厥墓前石人的特征是身穿翻领大衣、腰部束带、右手持杯、左手扶剑的形象;而这种墓前的石人往往只是在一块卵石的上端刻划出人面的形象,或仅仅表现一段上身,突出表现其项饰和双乳,有的甚至只用一块条形石象征人形。在石人后面用四块巨大的花岗岩石板砌成方形石棺,上面覆盖石板。石棺每边长达二、三米。棺内人骨纵横乱放,显然是采用丛葬制度。随葬品有打制石镞、石罐、石杯、陶容器、铜饰物等,未见铁器。⁽¹⁵⁾

第三种是一种土坑竖穴墓。这种墓葬遗址与上述石人——石棺墓经常在同一地区发现,但并不存在相叠压的关系。在这种墓中出土公元前四至三世纪时代的青铜素面镜,也有铁器。由此推测,前一种墓葬的年代似应较此为早。

上述这三种墓葬显然属于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化。由于迄今尚未进行大规模的发掘,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极为有限,故对其性质和历史背景还难以从事探讨,在这里仅提供一点线索而已。

在文献记载贫乏的条件下,对上文所阐述的几种文化究竟属于当时何种民族或部落,以

及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等问题,现在还不可能作出任何准确的解答。但是,在中国先秦时代(即公元前二世纪以前)的文献中,也能见到若干有关新疆地区地理状况和部落名称的零星报导,并且,有材料可以确知这个地区与黄河流域当时已存在着经济和文化上的关系。

就本章所讨论的时间范围和地域范围而言,古代文献的记载比较贫乏,而且还渗杂了一些传闻失实以至类似神话的报导。近现代学者对这些文献的解释意见分歧,迄今尚无定论。限于篇幅关系,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对这些复杂的问题进行探讨,甚至连作一简单而全面的介绍都不可能。我们只有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来描画一个最浅淡的轮廓。

公元前二世纪以前,无论西方或中国的文献记载,看来都偏重于新疆地区的北部,即偏重于阿尔太山区和准噶尔沙漠以北的草原;而对南疆地区似乎很少了解。这是因为在公元前七至二世纪期间,横贯欧亚大陆的交通线大体上是从中国内蒙古草原的河套附近向西北,越过阿尔太山,沿额尔齐斯河,穿过南西伯利亚草原,再往西,到达当时居住在黑海北岸的斯基太人地区。考古资料对此提供了充足的证据,从而引导我们对古代文献所叙述的地理位置有了较正确的理解。

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后期,出生于普洛康奈斯岛的希腊诗人阿利斯铁阿斯曾到中亚地区旅游过,并据他的见闻写下了长诗《独目人》(Arimaspea)。其后,公元前五世纪时的伟大史学家希罗多德根据《独目人》以及他自己从斯基太人处所得到的知识对中亚的东部情况有所报导。据他们的报导,在中亚地区的东北部分布着三个不同的民族,即:秃头的阿尔吉帕人(Argippaeans)、伊塞顿人(Issedonians)和独目的阿里马斯普人(Arimaspeans)。从最东端的斯基太人地区往东,首先遇到的是阿尔吉帕人。斯基太人地区是一片平原,而阿尔吉帕人则居住在崎岖不平的山地。由此可知,后者显然分布在哈萨克丘陵地带。判断伊塞顿人居住地区的重要根据有两点:其一、伊塞顿人在阿尔吉帕人以东;其二、伊塞顿人与居住在阿拉克赛斯河(Araxes)(即锡尔河Syr Darya)北岸的马萨吉太人(Massagetae)是相毗邻的。⁽¹⁶⁾因此,我们认为伊塞顿人只可能分布在楚河至伊犁河之间才符合上述两个条件。现代某些学者把伊塞顿人等同于居住在塔里木盆地或其东的月支人或乌孙人,⁽¹⁷⁾这在地理上不能符合上述条件。也有人认为伊塞顿人是居住在七河流域及其附近的乌孙人,⁽¹⁸⁾这与历史事实不符。因为,乌孙人在公元前二世纪以前并未西迁到七河流域,而仍住在塔里木盆地以东。而且,中国史籍明确地指出,西迁前的乌孙人只是一个弱小部落,他们的名字不足以突出地传播到远方;他们是在西迁以后合并了一部分月支人、塞卡人才强大起来的。⁽¹⁹⁾现代西方学者大多忽视这一点而过分强调早期乌孙人的文化,这似乎不是科学的态度。我们认为,伊塞顿人地区的东端可能到达中国新疆的伊犁河上游,但却未进入塔里木盆地。